

李益从军经历考辨

关 眉

在中唐的边塞诗中，李益的作品是最突出的。他荏苒从役，为文多军旅之思。《旧唐书·李益传》云：“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画为屏障；‘迴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下月如霜’之句，天下以为歌词。”可见当时影响很大。他的边塞诗，抒写战争给各族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表现了人民强烈要求收复国土的愿望，反映了中唐国运坎坷、外患频仍的现实。在艺术上，其七绝及歌行之作造诣最高，几近盛唐。但是，关于他的边塞生涯，历史记载甚缺。容肇祖《唐诗人李益的生平》、卞孝萱《李益年谱稿》（下称“卞谱”）、谭优学《李益行年考》（下称“谭考”）都对此作出很多贡献。但他们在李益的从军问题上考证出入较大：容肇祖定李益贞元初入刘济幕，贞元四年以前入韩游环邠宁幕。“卞谱”定李益建中元年入崔宁幕，建中三年入朱滔幕，贞元二年入论惟明幕，贞元四年入张献甫幕，贞元十二年入刘济幕。“谭考”定李益大历九年入臧希让幕，建中二年入李怀光幕，贞元元年入杜希全幕，贞元六年入张献甫幕，十三年入刘济幕。诸说不一。

李益有《从军诗序》（下称“诗序”），述及自己的生平及从军情况，全文如下：“君虞长始八岁，燕戎乱华。出身二十年，三受未秩；从事十八载，五在兵间。故其为文，咸多军旅之思。自建中初，故府司空巡行朔野，迨贞元初，又忝今尚书之命，从

此出上郡、五原四五年，荏苒从役。其中虽流落南北，亦多在军戎。凡所作边塞诸文及书奏余事，同时幕府选辟，多出词人。或因军中酒酣，或时塞上兵寝，相与拔剑秉笔，散怀于斯文，率皆出于慷慨意气，武毅犷厉。本其凉国，则世将之后，乃西州之遗民欤？亦其坎壈当世，发愤之所致也。时左补阙卢景亮见知于文者，令余辑录，遂成五十首赠之。”

这显然是一份珍贵的李益传记材料。但是，“谭考”对此表示怀疑，在注释中曰：“李益的《从军诗并序》，世甚罕见。既不见于《全唐文》，又不见于收罗甚富之陆心源辑《唐文拾遗》、《唐文续拾》，仅见于张澍于道光元年辑刻之《二酉堂丛书·李尚书诗集》，而陆‘拾’未收，或疑其伪？……泊取《唐诗纪事》卷三十李益门比勘，才恍然此序盖张澍据《纪事》作者计有功论李益之言而属缀成之者也。所以他不说明出处，也许毛病就在这里。”因此，有必要对“诗序”的真伪进行考核。

“诗序”并非始见于张澍《二酉堂丛书》。此书刻于清道光元年（1821），但在清康熙壬午（1702）席启寓刻的《唐诗百名家全集·李君虞诗集》已有“诗序”。席本之前，明末钱谦贞竹深堂抄本《唐四十七家诗·李君虞诗集》，^①明抄本《唐四十四家诗·李君虞诗集》^②均有“诗序”。此三种书今存，可以确证“诗序”并非清张澍“属缀成之”。

据清代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云：“李君虞诗集二卷，明刊宋本……此明弘正间刻本，作李君虞诗，即席启寓刊本之祖。”可知席本之祖为明刊宋本，则“诗序”在宋代已有刊本。而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载：“益录其从军诗赠左补阙卢景亮，自序云：从事十八载，五在兵间，故为文多军旅之思。或因军中酒酣，或时塞上兵寝，投剑束笔，散怀于斯，文率皆出乎慷慨意气，武毅犷厉，本其凉国，则世将之后，乃西州之遗民欤？亦其坎壈当世，发愤之所致也。其诗皆建中、贞元间作。”所谓“自

序”即摘录“诗序”语，而据计有功《唐诗纪事序》云，凡唐代“三百年文集、杂说、传记、遗史、碑志、石刻，下至一联一句。传颂口耳，悉搜采缮录；间捧宦牒，周游四方，名山胜地，残篇遗启墨，未尝弃去”。结合《善本书室藏书志》之说，则计有功当曾见宋本《李君虞诗集》。此又可见“谭考”所云似属臆测，实则《纪事》摘录“诗序”，此可作《诗序》在宋代已存的旁证。

今存李益诗集的明、清旧本，有的有“诗序”，有的无“诗序”。明嘉靖十九年刻本朱警《唐百家诗·李益集》无“诗序”，明嘉靖三十三年铜活字印本《唐廿六家诗·李益集》以及《全唐诗·李益诗》均无“诗序”。

为什么有的古本有“诗序”有的古本无“诗序”？今从李益诗集在历史上的流传情况分析之。

唐代史籍未见提及李益诗集。《新唐书·李益传》、《旧唐书·李益传》、《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未提李益诗集，《宋史·艺文志》始著录李益诗一卷。但是，宋代藏书家已著录李益诗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有李益诗一卷，记有：“右唐李益君虞也，……征人早行诗，天下皆施之图绘。今集有从军诗五十首而无此诗，惜其放逸多矣。”尤袤《遂初堂书目》有李君虞集、李益集。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有李益集二卷。此外，宋计有功《唐诗纪事》曰：“益录其从军诗赠左补阙卢景亮，自序云……”。首次提到“诗序”。

据以上引证，李益诗在唐代似尚未成集。北宋未见著录。至南宋晁公武、尤袤、陈振孙，李益诗集始有著录。由此可以推知：①目前能确定的李益诗成集的最早年代是南宋。②李益诗集从南宋就有两类版本。③李益从军诗五十首的提法，南宋已有之。④“诗序”在南宋已被提及。⑤“诗序”、从军诗五十首与李益诗集是同时出现的。

南宋以后，李益诗集又见于下列文献：明高儒《百川书志》

有李益集二卷和李君虞集二卷，后注：“礼部尚书陇西李益君虞撰。予所收唐诗，率多别本，出入不同，鲜卷数者，多从唐百家集。按此集苏州所刻，乃好事广积，将为久传，岂有一家分为两集之理？此中苏许公、李君虞、顾逋翁皆二集，抑为传者之别，更有说欤？姑并列以俟博考。”明胡震亨《唐音癸签》集录一：“李益诗一卷，从军诗五十首。”清李振宜《李沧苇藏书目》有“李益诗一本抄照宋。”清钱曾《述古堂藏书》有“李益君虞集二卷”。清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有“李君虞诗集二卷”。

可见宋以后李益诗集的两类版本都流传了下来，逐渐形成了以后的两个版本系统：

第一类版本：李君虞诗集二卷明刊宋本 据《善本书室藏书志》。

同上 明抄本 见《唐四十四家诗》。

同上 明末钱谦贞竹深堂抄本。

同上 清刻本 见席《唐诗百名家全集》。

李尚书诗集一卷清刻本 见张澍《二酉堂丛书》。

其特征为：书名《李君虞诗集》有“诗序”、从军诗较全。其中明抄本、钱抄本、席刊本的诗序排列完全一样，应是同一版本系统。张刻本之书名和诗序与上述各本均异。但载有“诗序”，从军诗也较全，故列于这类版本之内。第一类版本，可追溯到宋尤袤《遂初堂书目》所著录的《李君虞集》。还可往上追溯到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所著录之“李益诗一卷”。晁书提到李益字“君虞”，而“君虞”之字未见于新、旧《唐书·李益传》和柳宗元《先友记》以及其他唐人诗文，仅见于“诗序”，故推知晁书著录之“李益诗一卷”当有“诗序”。而且，晁书有从军诗五十首，似可推溯之为第一类版本的祖本。

第二类版本：李益集二卷 明抄本 见朱警《唐百名家诗》。

同上 明铜活字印本 见《唐廿六家诗》。

同上 清刻本 见《全唐诗》。

其特征为：书名《李益集》，无“诗序”。在三种书中，《唐廿六家诗·李益集》与《全唐诗·李益诗》的继承关系最明显。两集的诗排列体例基本一样，而且每种诗体的诗排列次序也完全一样，只是《全唐诗》比《廿六家》收诗较多，多者均加于每种诗体的前或后。可见两集来源于同一版本系统。又从《廿六家诗》无《从军有苦乐行》、《五城道中》、拾遗《赴邠宁留别》、《再赴渭北使府留别》、《盐州过胡儿饮马泉》来看，《廿六家》之祖本与从军诗五十首关系应较远。而朱警《唐百家诗》李益诗集因收诗谬误太多，不好分析它与其他古本的继承关系，现根据其无“诗序”，又无《从军北征》、《听晓角》、《盐州过胡儿饮马泉》、《从军有苦乐行》、《再赴渭北使府留别》等诗与《廿六家》相似，故放在同一系统中。

对比两类版本系统，可知前者与从军诗五十首关系较近，而后者则较远。故前者有“诗序”，后者无“诗序”。

根据以上考证，“诗序”信为李益所作，并可据以考证李益生平和从军经历。

“诗序”云：“自建中初，故府司空巡行朔野，迨贞元初，又忝今尚书之命，从此出上郡、五原四五年。”为考查李益的从军经历提供了重要线索。但是，“卞谱”及“谭考”对上郡、五原地理位置的认识似均未妥。“卞谱”引“诗序”：“从此出上郡五原”后，注曰：“五原即盐州。”“谭考”注曰：“上郡五原（今河套之地）。”按，李益所云“上郡”、“五原”，乃沿用古代的地理名称。

《輿地广记》卷一：“秦四十郡，上郡：麟、延安、丹、防、鄜、银、夏、绥德、保安。”

《元和郡县志》注为秦属上郡的州，有：夏州、绥州、银州，鄜州、丹州、延州。

《汉书·地理志》第八下：“五原郡……县十六：九原、固陵、五原、临沃、文国、河朔、蒲泽、南兴、武都、宜梁、曼柏成宜、莫黜、西安、阳，河目、稠阳。”即唐中受降城一带及胜州北部。

《隋书·地理志》：“五原郡，统县三：九原、永丰、安化。”即唐中、西受降城一带及宥、夏州北部。

《舆地广记》：“胜州……二汉属云中、五原二郡……隋……大业初立榆林郡，唐因之。”

《元和郡县志》：“盐州……汉武帝元朔二年置五原郡。”

据上可知，唐以前之上郡包括唐之鄯、坊、丹、延、绥、银及夏、胜州南部，五原包括唐之东、中、西受降城一带，夏、宥、胜州北部及盐州。

唐代亦曾用上郡、五原为郡名。《新唐书·地理志》：“鄯州洛交郡，上。本上郡，天宝元年更名。”又：“绥州，上郡”。“盐州五原郡……天宝元年更郡曰五原。”若根据唐代上郡、五原的地理概念来考证李益的诗文，则多有疑惑不解之处。如《盐州过胡儿饮马泉》（一作《过五原胡儿饮马泉》）一诗，在“绿杨著水草如烟，旧是胡儿饮马泉”一句后，注有：“鹑鹑泉在丰州城北。”《新唐书·地理志》：“西受降城……北三百里有鹑鹑泉。”而盐州在河套中部，与鹑鹑泉风马牛不相及。若此诗题为《过五原胡儿饮马泉》则合，诗中注鹑鹑泉在丰州城北，而丰州城正在古代五原的范围之中，可见诗名应是《过五原胡儿饮马泉》，另一名《盐州过胡儿饮马泉》乃后人传误。《唐人选唐诗》的《御览集》及《又玄集》均收有此诗，仅题：《过五原胡儿饮马泉》，甚是。“谭考”疑“鹑鹑泉似不止一处。”此由于对五原的地理概念未弄清所致。

又，或疑诗中之注鹑鹑泉在丰州城北”非李益自注。但参考李益的其他诗应亦可见此饮马泉乃指鹑鹑泉：《暖川》诗有：“胡风冻合鹑鹑泉”，此诗曰：“从来冻合关山路”，《再赴渭北使

府》有“跑泉饮鹓鹑”之句，此诗有“旧是胡儿饮马泉”皆可证。

《登长城》诗有“汉家今上郡，秦塞古长城”之句，若按唐代的上郡而言，上郡乃鄜州或绥州。而鄜州、绥州皆远离长城，诗中“上郡”和“长城”似连接不起来。但若用传统之上郡地理概念考之，则疑难自解，并可知此诗乃作者在夏州城附近的长城写的。《元和郡县志》：“夏州，德静县……秦长城在县西二里。宁朔县秦长城在县北十里。”联系诗人随崔宁“巡行朔野”，在夏州招抚党项之事，诗中“当今圣天子，不战四夷平”之意则明矣。“谭考”曰：“自榆林关渡河至东受降城，诗人有《登长城》诗。”非是。按此地从未曾称为上郡，诗系于此地，“上郡”一句无着落。

李益的《再赴渭北使府留别》还有“截海取蒲类，跑泉饮鹓鹑，汉庭中选重，更事五原西”之句。蒲类即蒲类海，在今乌鲁木齐附近。《后汉书·窦固传》：“窦固击呼衍王，追至蒲类海。”李益诗乃取此典故。鹓鹑泉在西受降城北。这两句诗抒发了诗人希望收复安史之乱后被外族占去的西北广大国土的豪情壮志。若“五原”只用唐代的地理概念——盐州，气势与上两句不相当，称用古代的五原地理概念——整个的河套北部，北至狼山、大青山的广大地区，则“更事五原西”的气概方能与上两句旗鼓相当，表现出诗人要彻底收复国土的情怀。

又，“诗序”云：“自建中初……，迨贞元初……，从此出上郡、五原四五年。”以李益诗观之，诗人涉历了相当广阔的地域，绝非只到了鄜州，绥州、盐州。此亦李益诗文中的上郡、五原是沿用古地名之一证。

在考实“诗序”的可靠性及考定上郡、五原地理概念的基础上，今考李益的从军经历如下：

李益的首次从军入幕，“卞谱”定为建中元年入崔宁幕。“谭考”定为大历九年入臧希让幕。今考之，当以“卞谱”为是。

“诗序”，“自建中初，故府司空巡引朔野，迨贞元初，又忝今尚书之命，从此出上郡、五原四五年。”据此，可得李益首次从军的线索：①时间，建中初。②所从之将帅，故府司空。③地理——巡行朔野。

又，分析李益首次从军所作的《从军有苦乐行》及《来从塞车骑行》两首诗，《从军有苦乐行》题下注“时从司空鱼公北征，鱼一作冀。”《来从塞车骑行》有“将军失恩泽，杀事从此异。置酒高台上，薄暮秋风至。长戟与我归，归来同弃置”之句。据此，李益首次所投之将帅，其条件为：①司空鱼公或冀公。②此将军后有失恩泽被召归之事。按崔宁符合于上述条件。《旧唐书·崔宁传》：“大历十四年……制授检核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御史大夫，京畿观察使、灵州大都督、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使、鄜坊丹延都团练观察使，托以重臣绥靖北边，但令居鄜州……宁巡边至夏州，刺史吕希倩与宁同力招抚党项，归顺者甚多，炎恶之，因奏希倩抚绥之功，才堪委任。召归朝，除右仆射知省事。”据《唐方镇年表》，崔宁召回时间为建中二年七月。“谭考”认为“巡行朔野”之“司空”非崔宁，其理由为崔宁至夏州就被杨炎谗罢回朝，没有再向北去。按《全唐文》卷四二六于邵《为崔仆射与朱泚书》曰：“相公阁下……十月之初，中官驿至，密奉晨翰，远使临边，拜受遂行，赴敌宜速，西山之役寻已加，兵将赴急，宣不遑启处……。”③书中提到“远使临边”的情况，非只在夏州，夏州当时还远不是边，从信上可知崔宁当时是北征。此书乃崔宁“巡行朔野”之时因朝内有人掣肘，修书与朱泚求其庇护。书中言“十月之初”，可知崔宁北征乃十月出发，崔宁大历十四年十一月始镇鄜州，建中二年七月召归，故此十月只能是建中元年十月，符合“诗序”的“自建中初，故府司空巡行朔野”之时间。另外，书中提到崔宁出发时军情之紧迫，与李益《来从塞车骑行》描写的出发气氛“追兵赴边急”相

吻合，又可证是同一件事。

又，“诗序”的写作年代，“卜谱”、“谭考”皆定为贞元四年，当是。因此，“故府司空当死于贞元四年以前，而崔宁正死于建中四年。

崔宁乃“冀公”。关于这点，新、旧《唐书》之崔宁传失载，检《全唐文》，卷五一三有于公异《为崔冀公请赴山陵表》，^④可知崔宁乃冀公。

崔宁被召回，乃因受杨炎排挤，又因兵权重，为德宗所疑。此事新、旧《唐书》及通鉴均有记载，与“将军失恩泽”诗意相符合。

综上所述，可见李益是于建中元年首次从军入崔宁幕。而“谭考”谓首次从军为大历九年入臧希让幕，非是。据“诗序”：“自建中初……迨贞元初……，从此出上郡、五原四五年。”故知李益出上郡、五原当在建中初。而臧希让是鄜坊节度使，就在上郡，臧希让大历九年防秋之地亦五原之地，故不应取。“谭考”否定李益建中初首次从军的理由为：一、李益“诗名早著”。二、“束发言兵”。这缺乏说服力。因“言兵”未必一定从军，唐朝士子之风尚就是喜言边策，好论军事。“结发逢世屯”亦不能和结发从军划等号。李益《再赴渭北使府留别》一诗中的：“结发事鸣鞞，连兵追谷蠡，山川搜伏虏，铠甲披重犀。”正可以证明诗人结发之年已从军。紧接着诗人又言：“故府旌旗在。”可见这次从军跟随之将帅，仍是建中初，巡行朔野之“故府”，而“故府”即指崔宁。

建中二年七月崔宁被召归，李益罢幕。

建中三年，李益入幽州节度使朱滔幕。根据韦应物《送李侍御益赴幽州幕》一诗。“谭考”谓是李益拟“返李怀光幕赴幽州。”疑非是。李怀光乃去幽州平朱滔，不能云“赴幽州幕”。幽州幕乃指幽州节度使幕府。

贞元元年，李益入鄜坊节度使唐朝臣幕。根据“诗序”：“迨

贞元初，又忝今尚书之命，从此出上郡、五原四五年。”诗《再赴渭北使府留别》，可知李益有再入渭北节度使幕之事。按，陆贽《翰苑集》有《唐朝臣振武节度使论惟明鄜坊观察使制》，云：“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兵部尚书兼鄜州刺史、鄜坊丹延等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平乐郡王唐朝臣……朝臣可依前检校兵部尚书兼单于大都护、御史大夫充振武绥银鄜胜等州节度营田处置押兵藩落等使。”可知：①唐是“尚书”。②唐曾为鄜坊节度使。③唐后改为振武节度使。又据《唐方镇年表》，知唐朝臣任鄜坊节度使在兴元元年至贞元二年七月，贞元二年七月后任振武节度使，可见唐朝臣与“诗序”所云“贞元初”、“今尚书”、“出上郡、五原”之说相符，故李益在贞元初当是入唐朝臣幕。

“卞谱”谓李益贞元二年、三年在论惟明幕，非是。李益贞元初所从之帅当是“今尚书”，而论惟明卒于贞元三年十一月。

“谭考”谓李益贞元元年秋入杜希全幕，亦不妥。因为杜希全是“灵州大都督、西受降城天德军灵盐丰夏节度营田等使”，虽涉及五原上郡之地，但主要是镇灵州，灵州不能称上郡、五原^⑤。

李益离开振武幕当在贞元四年。按《通鉴》卷二三三，德宗贞元四年八月：“振武节度使唐朝臣不严斥候，己未，奚、室韦寇振武，执宣慰中使二人，大掠人畜而去。时回纥数百骑追之，回纥使者为奚、室韦所杀。唐朝臣何时离振武节度使职，《唐方镇年表》没有具体材料，据《通鉴》所记，贞元六年振武节度使已非唐朝臣。有可能唐朝臣因严重失职之事被召回，李益亦随之罢幕归。按，《诗序》云：“从此出上郡、五原四五年。”今考李益入崔宁幕，出上郡、五原一年，入唐朝臣幕出上郡、五原三年多，总共是四五年。

李益贞元四年罢唐朝臣幕，入邠宁张献甫幕，当年有赠从军诗五十首与卢景亮之事。李益作“诗序”云：“从事十八载，五

在兵间”，入崔宁幕，其一；入朱滔幕，其二；入唐朝臣渭北幕，其三；入唐朝臣振武幕，其四；入张献甫幕，其五。

贞元十二年张献甫卒，李益入幽州刘济幕，当从“卜谱”、“谭考”之说。

本文对李益《从军诗序》的真伪作了考辨，在肯定其可靠的基础上，探讨李益的从军经历。由于笔者学识浅陋，肯定有不少错误，望批评指正。

注

- ①明抄本《唐四十七家诗》今藏北京图书馆。
- ②明抄本《唐四十四家诗》，今藏北京图书馆。
- ③于邵《为崔仆射与朱泚书》未著年月，根据书中曰“相公特禀庙漠，龚行天讨，分邠宁拔距之众，兼渔阳贾勇之军，偶俱无猜，上让下竞，用奖王室，作为人纲，一举而大义全，暂劳而殊功倍……。”又按《旧唐书·朱泚传》：“建中元年，泾州将刘文喜阻兵为乱，加泚四镇北庭行军、泾原节度使，与诸军讨之。泾州平，加泚中书令。”可见书中所言朱泚情事乃指建中元年平刘文喜之事。又据崔宁建中二年召回后未再出征，故此书只能作于建中元年或二年，书中所言崔宁“十月之初”“远使临边”“兵将赴急”之情事，估计是北上东中西受降城防回纥。因建中元年九月，在振武发生张光晟杀回纥商人九百余人、夺其财物之事。回纥可能已有报复姿态，或德宗恐回纥籍此举国入侵，故有派崔宁北征，巡行朔野之事。
- ④于公异《为崔冀公请赴山陵表》未提崔宁名字，但根据书中情事可知此崔冀公乃崔宁。书中云：“臣本山东布衣，耕于淇澳，弓裘陵替，无以庇身。属天宝中，元宗圣明，河海清晏，臣始忝宿卫，入侍丹墀，合门欢荣，长行同庆，泊禄山叛命，庆绪西侵……臣当此时有死无贰，于是执殳荷戟，渐拜偏裨，逮肃宗……臣遂东征西伐，式遏蕃蛮，荷宠承荣，稍迁将帅……一辞云陞，十载守边……。”据《旧唐书》：“崔宁，卫州人”。卫州是山东之地。又曰：“大历十四年入朝……兼山陵使。”符合书中请赴山陵之情事。书中自言身世经历亦符合崔宁情事。
- ⑤：古代上郡、五原之称不能用于灵州。据《元和郡县志》：“灵

州……秦并天下为北地郡，汉时为富平县之地……隋……为灵州。”

《文献通考》：“灵州，春秋时秦地，始皇属北地郡，二汉皆因之，晋亦同……隋炀帝初置灵武郡，唐为灵州或灵武郡。”

《困学纪闻十笺》未刊本

《困学纪闻》二十卷，宋王应麟撰。元刻本今存，明正统、万历刻本亦存，唯均无注校。注校而成书者应自清阎若璩始。此外，全祖望、程瑶田、钱大昕诸家亦有注校。嘉庆、道光间万希槐、翁元圻均刻有辑注本，书名或题三笺，或题五笺，甚或有题九笺者，如请嘉庆十九年壬申（1812）奉新竹冈赵敬襄辑注者。而黄培芳之标曰“十笺”则又是一种。此本未刊，系黄氏之亲笔注校，就其内容看，较前此之笺注有所充实。可作研究《困学纪闻》一书的资料使用。此本现藏北京图书馆。

黄培芳，广东香山，黄绍统子。字子实，一字香石，《国朝书画家笔录》卷三，《清史列传》卷八均载其事。北图所藏之《困学纪闻十笺》原系黄氏私人藏书，钤黄培芳印、香石读、子实、香石、岭海楼藏等印。黄氏笺注《困学纪闻》之情况，可以从下列之题语中看出。

1. 余读《困学纪闻》，初得阎何注本，继得万氏集证本，又得五笺本，于戊辰冬（今按：嘉庆十三年）始稍加丹铅，最后得此合注之本、两游京师，递有所增，而初校本已为友人丐去，因将前后所得荟萃斯编，即后日增加，亦录于此。惟此编所收虽富，尚病缪犗。余随得随录，亦未整齐，当删其繁复，刊为善本，予或不及，深望后人。培芳。

2. 嘉庆十三年戊辰冬香山黄培香石校补于羊石讲院。

3. （嘉庆）二十五年香石重增校于京师。

4. 道光三年癸未春借门人许编修乃普所藏汪选楼木再校。

所说“十笺”者，依黄氏之排列，实为十一家，故黄氏于拟定之书名《校订困学纪闻笺证卷之×》下云：“云十笺者举成数也，香石识”数语。十一人是：潜邱阎氏、谢山全氏、易田程氏、义门何氏、樸山方氏、蔚亭万氏、董浦杭氏、选楼汪氏、辛湄钱氏、四明屠氏及香石黄氏。

此“十笺本”黄氏未刊，就其所辑资料看，较其它诸家为细，可以看作是对此书笺注的补充，对研究《困学纪闻》有一定的作用。·英·